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基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分析 (1982-2017)

韩召颖 姜 潭

摘要:对1982年至201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进行的文本分析,从宏观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文本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主要表现为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变化和演进。具体来说,中国在对时代的判断上,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的时代潮流;对外安全观念中对安全威胁和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逐步确立了“合作、综合、共同”的安全观念;对现行国际秩序认同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逐步提出构建“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想则反映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化和演进。

关键词:中国外交理念;时代观;安全观;秩序观

中国外交政策的宏观框架,一般由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勾勒。^①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以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工作,另外还用一章的篇幅专门阐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政策主张。十九大提出的对外政策主张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外交的新理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因此,要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思想内涵,必须从宏观上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历史演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此,本文选取1982年以来历次党的报告作为文本,集中分析其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部分。文本分析发现,党的报告中所体现出的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构成了中国外交理念的三个重要思想内涵。^②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也主要表现为这三种观念的变化和演进。

一、时代观: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共赢

时代观,是人们以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观照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关于时代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

收稿日期:2017-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49)

作者简介: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姜潭,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① 王存刚:《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第4页。

② 这是在对党的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秦亚青教授的论述作出的判断。参见秦亚青:《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思想内涵》,《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第27-30页。

法,包括对划分时代的依据、时代的性质、内容、特征、主要矛盾、基本态势、发展趋势等的认识。^①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时代观是国家决策者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体判断,是内政外交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②科学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③。决策者对时代所作出的评估、对国际局势现状和发展趋势所作出的判断,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基本方针和内容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对时代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人类事物中的普遍现象。^④在这一时期,斗争哲学相对占据主导地位,在外交政策上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形势评估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对战争的大无畏态度以及以意识形态划线。^⑤“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在国内经济建设中,以随时会爆发战争为前提,为“备战备荒”,依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三线建设。在外交工作中,建国初期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展开对抗;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执行了既抗美又反苏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坚决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针对美国、印度、苏联等国威胁自身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⑦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外交工作中的一系列举措,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促进了国际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然而,由于过分强调了战争的危險和斗争的突出地位,国家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工作中“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做法也给国家的外交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害。^⑧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与此同时,在各项工作中逐渐弱化了斗争的突出地位。在对时代的判断上,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初步提出战争可以延缓的想法。^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⑩。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认为战争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到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⑪1987年,“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明确说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文件之中。^⑫此后,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时代的判断始终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① 王昌英:《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新中国60年主要领导人时代观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第62页。

② 秦亚青:《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思想内涵》,《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第1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④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⑤ 叶青:《从战争与革命到和谐世界——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发展与中国外交》,《国际展望》2011年第4期,第6-8页。

⑥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111、119页。

⑦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第21、83、140页。

⑧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第119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⑩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526432.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⑪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⑫ 《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6/65447/4526368.html>, 2017年12月10日。

中国时代观的一大变化是在继承和加强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基础上,强调了合作的必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上首次明确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①。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②。中国近年来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都反映出中国愈加强调的以合作为主题的时代观。

中国自第二代领导人起所确立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特别是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大战的危险急剧下降,国际形势总体上呈现出和平稳定的态势。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一直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在发展中也日益产生一些全球性问题。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一些西方国家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并表现出了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动向,试图“独善其身”。但是,当今国际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一国无法也无力提供解决方案,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只有各国之间开展广泛的合作,才能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能得到维护。正是由于这种对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中国才认识到合作已经成为当今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因此愈加强调以合作为主题的时代观。这种时代观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继承与创新,一方面,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发现了新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观的指导下,中国近年来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就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此外,对于时代的这一科学判断也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全球治理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各国的务实合作加以解决;大国之间,特别是主导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能再走对抗、冲突的老路,而要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安全观:逐步确立“合作、综合、共同”的安全观念

安全是国家生存之本。外交理念中的安全观即国家的对外安全、国际安全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全概念的基本意义是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涉及国家是否受到外来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③。在国际政治范畴内,对安全的定义是以国际环境为基本依据的。国家安全是主权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生存的需求,其核心安全利益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非核心安全利益则包括非国家层面和非传统的安全。^④因此,可以从对安全威胁和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来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安全观的演进。

①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②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11.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③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3页。

④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3页。

首先,中国对安全威胁的认识发生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视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但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开始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十八大以来,则在党的报告中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视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最大的威胁,霸权威胁的紧迫性在党的报告中不断下调并最终被移除。这种对安全威胁认知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表明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更趋一致,也更加增强了对“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的认识,从而扩大了开展国际安全合作的空间。另一方面,不断下调并最终移除霸权的威胁则表明中国不再视美国为自身安全的主要威胁,这说明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经过40多年的相互交往,中国逐渐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进行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选择对抗,对两国和世界则意味着灾难。当今的世界并不安宁,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方面肩负共同责任,加强对话与合作是两国最佳的理性战略选择^①,也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中国希望与美国在外交安全领域妥善管控分歧,扩大互利合作,以更好应对威胁全球安全的共同挑战。党的报告中对安全威胁认知的创新性变化,充分表明中国逐步确立了对外安全观中的合作观念。

安全观念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如图1所示,安全利益有着不同层次的分布,图1中纵坐标表示的是从个人到世界多个层次上的安全;而从横坐标可以发现,即便是在国家层次上,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信息、文化等多方面的安全利益,图1中的中心椭圆区域则代表了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下文将结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解读,来探究中国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争取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即保障中国的政治安全。而建国后不久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随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则使中国切实感受到了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严重威胁。因此,建国初期,中国对安全利益的认识是:高度关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政治、军事安全并重。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中国的政治安全已经不再是国家安全中最紧迫的问题。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导致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愈加严重,中苏两国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因此,军事安全日益成为中国最为关注的安全利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之后,中国认为军事安全已经不再是国家安全的迫切问题,在中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中,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地位相对下降,对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开始明显上升。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我国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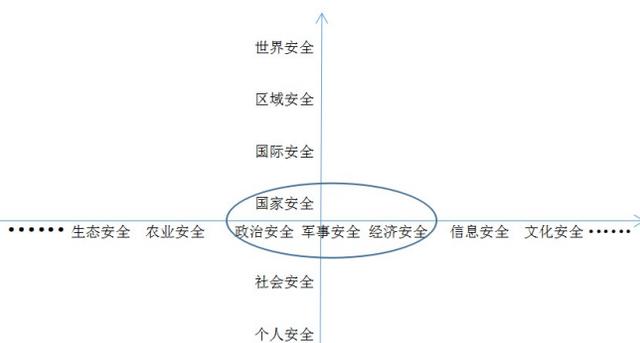


图1 安全利益示意图

资料来源: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① 韩召颖:《习近平访美:关键时刻的重要访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2日,第8版。

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①。十七大报告中则首次明确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②,表明中国已经将经济安全视为与政治、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的安全利益。

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中国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突破了传统的核心安全观念,开始重视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指出,世界各国应该“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③。十八大报告则开始对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加以关注。^④十九大报告也强调了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⑤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对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视。

中国对安全利益认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突破了单纯的国家安全考虑,开始更多地关注安全利益图纵坐标上非国家安全的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⑥。其中,互利是指各国应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⑦。这标志着中国对于安全利益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国家单方的考虑,开始将国际、区域乃至世界的共同安全视作自己的安全利益。2012年,在外交工作中“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的论述首次出现在党的报告中。^⑧这标志着在中国的对外安全观念中,开始将社会安全、个人安全视为重要的安全利益。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中国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在不断拓展。首先,主张综合安全,即在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核心安全利益的基础上,逐渐关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其次,越来越强调共同安全,即更多地关注非国家层面的安全。因此,对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逐步确立了中国对外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的理念。

三、秩序观:更加认同现行秩序并逐步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

国家外交理念中的秩序观即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它“既是国家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国家对理想国际社会的信念”^⑨。也就是说,国际秩序观既包含了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也蕴含着国家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愿景。国际秩序观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具体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⑩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2017年12月10日。

②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2017年12月10日。

③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2017年12月10日。

④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11.html,2017年12月10日。

⑤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7年12月10日。

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2017年12月10日。

⑦ 《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第3版。

⑧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11.html,2017年12月10日。

⑨ 秦亚青:《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思想内涵》,《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第30页。

⑩ 董贺、袁正清:《中国国际秩序观:形成与内核》,《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第45页。

变化与演进,其主要表现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越来越高,并逐步提出构建“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

为衡量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本文选取1982年至2017年党的报告中对于国际秩序的评述性话语,并对其进行赋值。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要“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①。其中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是要“冲破”“斗争”,属于高度不认同,在认同程度上可赋值为-2。在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都将现行国际秩序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认为其“不公正、不合理”,不认可度有所降低,在认同程度上可赋值为-1。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不再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提法,但强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虽然仍认为现行国际秩序存不公正、不合理之处,但已经不再用否定性话语来加以指责,因此可以将认同程度赋值为0。十八大报告中则表述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认同程度较十七大又有所提高,可赋值为1。2017年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表示要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至此,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已经达成了高度正向认同,认同程度赋值为2。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越来越高,已经由高度不认同转变为高度认同。

表1 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1982-2017)

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评述性话语表述	“冲破”“斗争”	“不公正、不合理”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认同程度赋值	-2	-1	0	1	2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2017年12月10日。

在对现有国际秩序认同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中国也逐渐开始表达自己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构想。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②。随后的十五大报告中则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和原则,“这种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③。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国提出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具体领域的原则思考,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④。这些原则至今仍是中国对理想国际秩序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首次提出了较为成熟和具体的关于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即“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①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526432.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 2017年12月10日。

③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90.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④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 2017年12月10日。

繁荣的和谐世界”^①。这一构想蕴含着中国文化中对和谐的追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霍布斯文化中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丛林”情景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观。随后,中国开始强调“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②,共同为理想国际秩序的构建而努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国际秩序理念。涉及问题领域的不断扩大表明中国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构想更加具体和成熟,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的陆续提出则体现了中国逐渐确立了构建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愿景。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愈加关注。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愈加激烈。^③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解读,可以发现对现行国际秩序的高度认同和推动“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构成了当前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中国外交理念中的国际秩序观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实践中形成的,又必然会对中国的外交实践乃至未来国际秩序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当前,现行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变革、调整和转型的关键阶段,而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全球性问题频发的困境。中国国际秩序观中对现行秩序的高度认同,就是在现有秩序内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维持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理想,则表明中国已意识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全球性问题对民族国家提出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要求,当今国际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和未来国际秩序的塑造已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事情,需要国际体系中的各个国家以“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式参与其中。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新型秩序观的集中体现

从宏观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历史演进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和新战略。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最新论述,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变化和演进中形成的,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最终体现。

与以往党的报告相比,十九大报告在关于外交工作的阐述中首次提出了如下重要论述:“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④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最新理念,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国际秩序观念。

①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②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11.html>, 2017年12月10日。

③ Sebastian Rosato,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Issue 3, 2015, pp.48-88; David Lake, “The Challenge: The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3, 2014, pp.442-447; Dingding Chen, Xiaoyu Pu,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Issue 3, 2013, pp.176-173; Charles L. 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Issue 4, 2015, pp.49-90;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220, p.228.

④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2017年12月10日。

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主要表现为更加认同现行秩序并逐步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自由、开放的贸易和经济秩序是现行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中国曾经对这一经济秩序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逐渐认识到,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①。正是出于这种判断,中国勇敢地迈向了世界市场。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17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中国对现行经济秩序认同态度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当前,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西方国家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全球化进程有所退潮的情况下,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承诺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既是对中国利益的维护,也是对现行经济秩序的维护,表明了中国在现有秩序内做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坚定立场。

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同时,中国也在日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人类理想国际秩序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十九大报告中,这一点集中表现为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观念中,国家间的实力分配决定着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国际体系呈现出西方霍布斯文化中“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是高度竞争的零和博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就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是中国所要为之努力推动构建的理想国际秩序。

为此,中国提出在国际交往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对外政策主张。第一,坚持正确义利观,即是在对外交往中不只追求本国之“利”,还要遵循公平正义之“义”,其实质就是反对传统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调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第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举措。中国提出并建设“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在这一开放包容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各有不同,伙伴关系的名称和形式也不尽一致,但其实质内涵都是平等相待,互利共赢,都超越了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的这一重要实践,为各国之间探索相处之道提供了新的选择,受到各方的普遍欢迎和认可。”^②第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国际秩序理想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体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全球问题的产生使得全球治理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塑造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但是,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性在不断下降,全球治理机制亟需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但又不寻求自身的主导作用,而是在全球治理中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主张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合作共赢。

五、结 语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体现出的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构成了中国外交

①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18/c_1120331545.htm, 2017年9月21日。

② 王毅:《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 <http://www.mfa.gov.cn/web/wjbxhd/t1518042.shtml>, 2017年12月10日。

理念的三个重要思想内涵。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就表现为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变化和演进。具体来说,中国在对时代的判断上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的时代潮流;对外安全观念中对安全威胁和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逐步确立了“合作、综合、共同”的安全观念;在对现有国际秩序认同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构建“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想则反映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

中国改革开放已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并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究中国外交理念的变化和演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对此提出的思考和反思,有助于中国外交理念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推动中国外交实践不断进步。^①此外,对中国外交理念演进历程的诠释和说明,也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外交理念的理解和认同,有利于中国讲好自己故事、提升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并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Evolu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Concep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2-2017)

Han Zhaoying, Jiang Tan

Abstract: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1982 to 2017 will macroscopically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concep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ult of textu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concep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hanges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imes,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and the concept of world order. To be more specific, in terms of China's evaluation of the time we are in, it adds and emphasizes the idea of cooperation besides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ncepts that have long been held as themes of our time. The changes in China's perception of security threats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n terms of external security reflect China's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a concept of security that emphasizes "cooperation, integr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recognition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progressive proposal of a new type of intentional relations that advocate "peac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relationship"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tic Conception; Concept of Times; Security Concept; Concept of Order

【责任编辑:张栋豪】

^① 例如,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思考和反思,促进了中国在理念上对全球治理的理解,进而推动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外交实践。